张恨水早期小说创作与佛教文化

彭正生 方习文 方维保

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文化的关系极为复杂，在新旧文化冲突、中西文明碰撞的时代，佛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各自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渗透进现代文学。始终徘徊于新文学阵营之外的张恨水对待佛教文化有着不同于新文学作家的接受心态，他坦然接受佛学，并自称“老僧”。张恨水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接触佛教文化，他自称在创作《新斩鬼传》时“常看些佛书”，又说：“三年前的我，未曾入佛学的门径，提起笔来就是光芒四散。现在我虽用不着忏悔，然而我受了佛学的淘溶，我很愿意适可而止了。”[1][P9]学佛读佛不仅加深了张恨水对佛教教义的理解和领悟，更深化了其对世界、生命的认知和感悟，因此，张恨水早期创作主动且有意识地将佛教文化因素运用于其小说叙事安排、人物选择与形象设计以及主题意蕴的提炼，深深地打上了佛教文化的烙印。

一、佛教文化对张恨水早期小说叙事的影响

叙事文学的基本特征是讲故事，然而，因时代、宗教及文化之差异，不同的文学家即使面对相同内核的故事题材，其所呈现的叙事形态和故事讲述方式也各有不同。例如：复仇题材的故事中西皆有，然而在《哈姆雷特》里，受基督教文化的“救赎”、“忏悔”精神影响，哈姆雷特不能于仇人克劳迪斯忏悔之际将其杀死，因为如果在克劳迪斯忏悔时杀死他，就会将他送入天堂，这与他为父报仇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由于每当哈姆雷特意欲行动时，均发现克劳迪斯正在忏悔，因此，他不得不一再取消行动，从而使为父报仇的行动一再推延，故事叙事也因此变得缓慢和曲折跌宕。据基督教教义：“忏悔”乃灵魂安息及迈向天堂之路的必要条件，是为洗刷尘世之罪。未经自我忏悔（或他人为之祈祷）之人，死后会成为游魂野鬼，入下地狱。此基督教义在西方文艺中的表现不仅限于《哈姆雷特》，在其他作品中也大量存在。相较之下，东方游侠文化的“侠义”、“正义”精神，佛教文化“因果”观的渗透，使东方文化背景下的“子报父仇”的叙事显得迅捷和快意很多。

张恨水阅历丰富，其小说涵盖众生万象，他曾说：“我于小说的取材，是多方面的，意思是多试一试。期间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者多。”[2][P90]虽然取材广泛，涉猎宏阔，然而受佛教文化的影响，张恨水早期小说叙事特点却呈现出“因缘”流程和“苦空”架构。在谈到小说《啼笑因缘》为何取名“啼笑因缘”而非“啼笑姻缘”时，张恨水解释道：“《啼笑因缘》并不是写婚姻的。因‘因缘’二字，本是佛经中的禅语，社会上又把这二字移用，通常多作‘机缘’解，意思是指十分巧合的机会。小说《啼笑因缘》，除了机会、机遇之外，还包含一种因果缘分，这是指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在生活中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这个关系又让人产生了啼、笑、恩、怨、亲、仇交织的离合。”[3][P63]非“姻缘”而取“因缘”，一字之别却暗含着张恨水对佛教“因缘说”的体认和领会。“因缘”说认为人和世界皆因缘而有生有灭，而人生则有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12个因果相连之环节，前者为后者之因，后者为前者之果。“因缘”观将内因和外缘相结合，“外缘”偏于偶然、机缘和巧合，“内因”侧向因果、必然和联系，由此形成既“缘分”又“报应”独特的佛家命运观，而非机械、庸俗的宿命论。张恨水对佛教“因缘说”不仅从精神层面来领悟，而且将其纳入小说叙事之中，从而使小说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人物命运的起承转合归于“机会”和“因果缘分”，从而使小说叙事在巧合、偶然和必然、因果之间起伏跌宕。《啼笑因缘》中沈凤喜与何丽娜长相酷似是偶然，由此而引发出的一系列让人啼笑不得之误会；军阀刘德贵终因坏事做绝而被关秀姑用“点穴功”杀死；樊家树与江湖侠士关寿峰父女天桥不期偶遇等情节均体现了偶然与必然、巧合与联系、机缘与因果之观念。

在论及中国古代小说叙事时，刘书成指出：“在佛教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小说的艺术形态具有结构上因果完整、内容上突出教化、情节上真幻交织的特点”。[4][P45]事实上，不仅古代小说，由以上几部张恨水的现代通俗小说之叙事来看，张恨水也以“因缘”为线进行叙事的谋划构思，将之悄然地糅合进小说叙事的行进流程当中。

新文化运动伊始，胡适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其持论之一是：中国文化传统缺乏悲剧精神。张恨水也时常感叹“人生无常”、“人生宇宙间，岂非一玄妙不可捉摸之悲剧乎？”[5][P1]不过显然，张恨水之悲剧并非胡适之悲剧，若胡适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而认同可以引起“同情”和“净化”之悲剧，张恨水更多的佛教文化对人生“苦”、“空”的苦难之悲。也由此，张恨水形成了其独特的宇宙观、生命观，并且将其落实于小说叙事之中：“宇宙就是缺憾的，留些缺憾，才令人过后思量，如嚼橄榄一样，津津有味。若必写到末了，大热闹一阵，如肥鸡大肉，吃完了也就吃完了，恐怕那味儿，不及这样有余不尽的橄榄滋味好尝吧！”[6][P244]因此，细读张氏早期小说，其特点喜聚焦社会苦难和人物命运之悲，折射作者对“苦谛”的深刻感受，并在小说叙事的整体架构上皆以“苦”、“空”为结。《春明外史》中，时常与人谈佛论经之杨杏园在“色即是空”的感悟之后，转心向佛而沉浸于“一花一世界，三藐三菩提”之佛境，最终手捧《大乘起信论》圆寂。《金粉世家》中，冷清秋心怀佛缘抄录《金刚经》，对金燕西绝望之余，心如槁木死灰，闭于小楼，青灯枯卷，寻求内心安宁与慰藉，同“佛像、蒲团、木鱼、磬、香炉蜡台”为伴。金太太则是遭遇“树倒猢狲散”的家庭崩散之后，精神遭受沉重打击，为洗除现世烦恼，孤独地在西山别墅学佛念经。《啼笑因缘》中，关秀姑对樊家树的爱情陷入绝望之际，转向《金刚经》、《莲花经》以寻求解脱；何丽娜最终隐居西山，茹素学佛。

由此可以看出，“苦”、“空”在张恨水小说中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佛教观念，而且体现在小说叙事的整体架构安排当中，成为一种思维定势和叙事结构之模式，即每个人的结局和小说的结尾都指向“苦”、“空”。因此，有人指出：“就张恨水创作的实际而言，已与‘鸳鸯派’作家有了很大的不同，就‘鸳鸯派’作家所擅长的‘才子佳人’模式，在张恨水这里已有相当的突破，张恨水的‘言情’与‘三圆式’（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奉子成婚大团圆)的‘言情’具有明显不同，往往是‘才子’和‘佳人’不得团圆。”[7][P272]

二、佛教文化对张恨水早期小说中人物形象塑造的影响

勃兰兑斯说文学史本质上是人类的“心灵史”。于叙事文学而言，人类心灵的变迁无疑最终落实到作品里的人物形象。因此，从这种意义而言，叙事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流变史其实就是某种维度的文学史和人类心灵史，是不同民族、不同时代文化之典型符号，不单是小说家主观虚构了人物，而是人物客观体现着时代、民族和文化。例如：俄狄浦斯、普罗米修斯等形象代表了古希腊文化对英雄的想象和命运的理解，罗密欧、哈姆雷特等形象则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精神的高扬，而拉斯科尔尼科夫便是19世纪人类非理性精神的形象化。正是这些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清晰、简明地串联起整个西方文明的行进历程。

中国现代文学诞生于特殊的时空背景，被赋予“救亡”和“启蒙”之特殊历史任务，由此，叙事性文学在人物选择上带有浓郁的时代特性。“启蒙”的双重主体——实施者（知识分子）和受施者（农民）——则当然地成为主流小说家设置人物的必然选择。

佛教文化对张恨水小说创作的人物选择特点是：许多人物形象具有浓郁的佛教文化意识，或喜谈佛论经，或曾学佛礼佛，甚至有人出家为僧。“张恨水小说中的人物是一种文化‘镜像’，体现了张恨水的一种文化思考”[1][P9]，张恨水通过这些“镜像”式的人物探索的是与新文化运动时期其他作家不同的另一种生活方式、生命姿态。

《春明外史》中的杨杏园是一个对佛教文化眷恋深深乃至痴迷的人物，其精神内层存留的是“消极避世，清静悲悯”的佛家文化基因，置身于“染缸”社会之中，却想出淤泥而不染。一旦愁肠百结，佛家学说便成了他解除现实烦恼的选择。小说末尾，这位风流自赏、正直清高的主人公在连番打击下消极厌世，求助佛经以超脱烦恼、破除“我执”。事实上，这个亦新亦旧、佛教色彩浓郁的悲剧人物是张恨水基于佛教文化之影响对新旧交替历史的思考，同时也是对人的生存形态的一种思考：乱世如何生存？入世可能同流合污，出世又如何救世？《啼笑姻缘》中关秀姑在对樊家树单恋的痛苦中产生“万事皆空”之念，何丽娜在樊家树冷落下悄然遁迹西山，茹素学佛。此两个佛缘之人均因现实挫折而倾心于佛，以寻求精神寄托。她们的选择实际上代表的是张恨水对于苦闷现世中人之出路的方案设计。当然，最能反映佛教文化与张恨水笔下人物形象关系密切的作品是《金粉世家》。在这部80万言的长篇巨构中，张恨水刻画了两个与佛学有渊源的人物形象：金太太和冷清秋。小说第八十四回，金太太目睹家庭溃败，心酸地道：“迟早是一散，散早些，我少受气，不好吗？……人生无论什么都是空的”。一拜佛之人，历经一世荣华富贵，垂老之年却人散家破，心灰意冷独去西山伴佛，排解尘世之苦与烦恼。可以说，作者是将自己独特的人生体验和时代感悟附体于金太太这个人物。而被称为“女杨杏园”的冷清秋，对爱情和婚姻真诚不二，第九十四回中她对金太太以坚定的口吻道：“夫妻完全是靠爱情维持的，既没有了爱情，夫妻结合的要素就没有了”，因为“佛教宣扬的爱以真诚为前提，不诚则无所谓爱，爱至深处是为真，是为诚”[8][P30]。决裂后的小楼学佛，决然走上向苦难和不幸的爱情婚姻生活抗争之路，则体现了佛教文化的超脱和自我拯救精神对冷清秋个性精神的浸染，而“自力拯救是佛教特质之一。”[9][P109]对于冷清秋或者张恨水而言，“佛、上帝已经由目的变为手段。信仰的最终目的不是通过神秘的宗教体验，获得与佛、上帝同在的最高幸福，解脱不幸和苦难，而是借用宗教净化感情、增强勇气，以自己的力量同不幸和苦难作斗争。”[10][P32]张恨水正是通过冷清秋形象来显示佛教文化在民族精神改造中的作用。

综上所论，张恨水通过笔下佛教文化色彩浓厚的人物及其命运为生存于乱世的普通中国人的生存方式、现实和精神出路进行思考和引导，而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比新文学作家们在其知识分子或者农民形象里寄托着的“启蒙”及“改造国民性”的济世良方更有实用价值和现实作用。一方面，张恨水作为与主流新文化运动疏远的通俗作家，其人物选择上浓厚的佛教色彩显示出其边缘化和独特性，不是面向精英而是面向市民；一方面，张恨水又并非完全与时代脱节，其笔下的人物命运和人生选择也体现了张恨水对时代的回应，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

三、佛教文化对张恨水早期小说主题意蕴的影响

张恨水早期小说叙事“因果”流程及“苦空”架构，以及以佛教色彩浓厚的笔下人物为“镜像”来思考当时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命姿态，此二者均显示出佛教文化之于张恨水早期小说创作的重要性及意义。然而，佛教文化之于张氏早期小说创作，其深刻影响不仅留存在叙事流程、架构和人物形象设置等形式层面，更为深刻地烙印在主题意蕴和精神层面。

具体而言，张恨水通过小说情节及人物命运将佛教文化的“悲苦观”、“色空观”、“因缘”说以及平等精神、超越品质、慈悲情怀等因素融进其早期小说主旨，并由此极大地丰富了其通俗小说的文化内涵，使张恨水真正做到了以雅入俗、俗中含雅的创作目的，从而达到打通雅俗，提高通俗小说文化品位的效果。

首先，佛教文化的“人世苦痛”、“万事皆空”最为典型地体现在张恨水的小说世界，从而使张恨水小说弥漫的是一种浓郁的感伤悲情色彩。美国有学者指出：张恨水小说中笼罩着一层“如梦的色彩”，一种“周末小说”式的浪漫感伤主义“氛围”[11][P147-148]。张恨水小说“梦幻”、“感伤”之实质，是作者面对社会政治、伦理的现代性转变，敏锐地捕捉到市民阶层普遍的时代情绪，并将其内心世界之感受和生命体验与佛教思想对人生、世界之领悟相暗合，这种领悟即是佛教的“悲苦”和“色空”，也是张恨水时常感叹的“人生无常”和“不可捉摸之悲剧”。《春明外史》中杨杏园在经历社会、人生和爱情的连番打击之后，在佛学里寻求精神寄托，破除“我执”，悟空世事，最后在佛像面前逝去。杨杏园的命运和人生经历正好印证了佛家所言的人生是“苦聚”，万事空归寂。小说这种叙事的悲剧性和感伤色调，让读者久久不能忘怀，如嚼橄榄。《金粉世家》中的金太太一世大富大贵，可以说是看尽人间繁华，到晚年却弄个人散家破上山修行。这种“色空”观念使《金粉世家》的人物结局笼罩上了一层浓厚的哀苦感伤色调，增添了悲剧的魅力。值得一提的是《金粉世家》中的女主人公冷清秋在佛家思想中寻找到了抗拒自身悲剧命运的精神动力，终于在金家大火中涅槃重生。是佛家思想让她拥有了敢于抗争与追求的悲剧精神。

其次，佛教文化内蕴里的“慈悲心怀”、“悲悯情怀”使张恨水小说具有强烈的情感弹性和张力。其一方面以同情的方式来书写社会下层人民的困苦、悲欢、离合和聚散，在每个被损害和被侮辱的灵魂上面寄托着深厚的悲悯，甚至在难以排遣的悲剧面前，他利用超越、解脱等方式给人物以解困。另一方面，他又直面社会、时代的黑暗一面，不遗余力地揭露上层社会的荒淫腐朽，尽显社会各界的丑恶现象，因而具有强烈的讽刺性和批判力度，甚至于利用佛教的“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来满足自己在现实世界里无法实现的情感宣泄。《春明外史》结尾处杨杏园凄然死去时，作者在字里行间里溢露出的慈悲现于言表；《金粉世家》一切皆空和前尘如梦之感叹，与其说是小说主人公的感叹，不如说是作者因同情众生和怜悯生命的叹息。然而，需要看到的是：张恨水这种对芸芸众生的宗教式情感关怀，更多的是主张精神的皈依与对现实的逃避，从而缺少新文学作家、作品中的那种控诉渴望和战斗精神。佛教对于“三界火宅”中受苦的众生充满了爱心，这种爱心用佛教语言来表达就是慈悲，慈悲则根基于怜悯的心念，这往往会凝成一种浑厚和悲凉。

再次，张恨水还自觉地将佛教的独立、平等精神与“新文化”倡导的平等、自由、民主等先进思想潮流相融合。虽然其小说中的独立、平等精神的实质与五四倡导的平等、独立有差异，但也显示出张恨水精神世界不屈服、不奴从和反抗的一面。在《金粉世家》中，冷清秋追求至真、至纯、纯净透彻之爱；主动放弃仅存形式、无爱的爱情和婚姻；大火之后果决的离走和开始新生，这些情节显示出的是佛教涅槃般的新生、人格独立和平等精神。当然，也应看到，张恨水小说中的平等与独立精神因佛教文化的浸染更多的是带有放弃和退让之色彩，而并非五四主流作家所标榜和宣扬的带有积极争取色彩的平等与独立。

张恨水之故乡“南岳”——天柱山，曾是佛教圣地，佛教禅宗二祖、三祖皆曾于此传授衣钵。天柱山麓之三祖寺乃全国著名寺院，香火旺盛，佛风弥漫；张恨水年少聪慧，饱读传统文学作品，如《红楼梦》《西游记》，甚至《南柯记》《枕中记》等等，这些作品中皆包含相当浓厚的佛教思想，加之张恨水生活于乱世，无法寄托之生命理想，无法排遣之精神苦闷客观上也导致其与佛教教义的亲近，对世事无常、人世苦痛等佛教思想感触良多。可以说，佛教文化已经如同血液流淌于张恨水之心灵，沉淀于其精神深处，成为他思考社会人生和艺术创作的一种特有角度。

参考文献：

[1]温奉桥.张恨水小说与宗教文化[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2]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3]张伍.热闹非凡的《啼笑因缘》现象[A].雪泥印痕：我的父亲张恨水[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

[4]刘书成.论佛教文化影响下古代小说的三大功能[J].社科纵横，2000,（1）.

[5]张恨水.作者原序[A].金粉世家（上）[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

[6]张恨水.作完《啼笑因缘》后说的话[A].张占国，魏守忠编.张恨水研究资料[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

[7]温奉桥，李萌羽.论张恨水小说的若干特点[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3）.

[8]潘伟.试论佛学对许地山文学创作的影响[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3，（6）.

[9]李远杰.佛教的特质与现代意义[J].中华文化论坛，2002，（2）.

[10]陈平原.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A].陈平原小说史论集（上）[C].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11][美]麦克莱伦.从梦幻浪漫主义到恶梦现实主义[A].张恨水研究会编.张恨水研究论文集（二）[C].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作者简介：彭正生，巢湖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博士；方习文，巢湖学院中文系主任、教授；方维保，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